

湯恩伯的一生

心如鐵石氣奪風雷

在剿赤抗日戰史上，湯恩伯可算是一位出類拔萃的名將。

他不但具備軍人的「智、信、仁、勇、嚴」的五大美德，而且特別充溢「祇盡義務，不爭權利」的精神，他經常表示：「人所不願爲的事交我，人所不願打的仗交我，人所不願履的險我去！」

他說此話，不是喊口號、唱高調，而是往往見諸事實的。當民國廿三年江西剿匪，直搗瑞金之役，他曾自告奮勇，担任白水、貫橋、驛前一路的主攻，打開犁庭掃穴的勝利之門。

他以為軍人應當向邊防方面發展，邊防守得好，國防自然鞏固；於是，他曾自動請求到西北屯墾，鞏固邊防，所以才有率領第十三軍遠成綏遠的事實，進而有痛擊偽蒙軍，收復百靈廟的戰果。

抗戰開始，他在綏東，於七月十六日，即首先請求蔣委員長下動員令；於是進駐南口，對氣勢方張的強敵，展開堅強的防禦戰，第一次予敵軍以慘重的打擊。

他最初以統轄兩個師的第十三軍爲基本，隨着任務的加重，指揮多達五十萬衆，成爲抗戰期間最主要的

機動兵團。自南口之戰開始，至獨山阻敵，收復桂柳，轉戰黃河、長江、珠江流域，幾乎凡重要戰事，無役不與，部隊特別辛勞，大都苦戰有功。

戡亂期間，重要的淞滬保衛和金門防衛戰，仍然由他負責指揮。結果，淞滬之戰達成任務後，能將大軍作有計劃有秩序的撤退；金門之役，則聚殲來犯之敵，奠定台灣安固的基礎。

除了上述「祇盡義務，不求權利」的精神外，他還特具「爲人不爲己」的精神，處處爲公，不爲自謀。當上海保衛戰即將開始之前，共匪曾經透過浙江省主席陳儀與他親如父子的關係，提出「策反」事件，他毫不考慮，毅然向 蔣總裁檢舉。

他的「奉公無我」的精神，不但深獲長官的期許，輿論的推崇，部屬的愛戴，而且也使敵人折服。卽如素行奸猾傲慢的共酋葉劍英，當其在南岳游擊幹部訓練班與湯將軍相處時（當時國共合作，湯爲教育長，葉副之），對他也佩服備至，曾謂：「在國共合作時，湯恩伯是共產黨的最好友人；國共分裂時，湯恩伯將是共產黨的最大敵手。」

當他於民國四十三年六月廿九日在日本東京慶應醫院病逝時，曾在戰場上把他當爲死敵的日軍，以及日本國人，却爲他表示從所未有的哀痛感傷。許多男女老少，川流不息的到醫院去瞻仰他的遺容，放聲大哭。有的從上午站到下午入殮時，仍不忍離去，一直守住他的靈柩，在醫院過夜。七月三日，在青山齋湯

公祭時，日本人幾乎動員了全部權貴和朝野知名之士，鄭重其事的穿着大禮服，向他祭奠。

他大智若愚，才不外露，坦直率真，果斷決行。特別在統御上，表現出無限的熱力和活力，所以常能在非常時期，打開環境，變不可能為可能，洵非他人所及。富蘭克林曾謂：「任憑環境控制，受命運支配的，只是一般的動物和草木。」他却是環境的創造者，從不為環境所限制。

民國五十三年六月，他逝世十週年，顧祝同上將會題詞稱讚他：「心如鐵石，氣奪風雷」。

從以下較為詳細的敘述中，不難了解他確是一位難能罕覯的名將，所謂：「心如鐵石，氣奪風雷」，他實當之無愧。

穩紮穩打步步為營

湯將軍名克勤，字恩伯，以字行。民國前十二年生，世居浙江武義縣湯村鎮。儒家子弟。少讀經史，慷慨有大志。浙江體育專門學校畢業後，因嚮往革命，隻身赴粵，入援閩浙軍講武堂。廿一歲畢業，任排長。但他以為處在國家多事之秋，應當再多充實一己的學識，用為他日担当大任的基礎。所以他再排除萬難，東渡日本，先入明治大學習政治經濟，再入陸軍士官學校習軍事。

民國十五年學成歸國，即獻身革命，初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旋升作戰科長，參加北伐。十七年，在軍校六期學生大隊長任內，著「步兵連教練之研究」一書，獲校長 蔣公嘉許，累晉軍官團副團長

，春風化雨，頗多獻作。而其文武兼資，受人識敬，也自此開端。

民國十八年秋，追隨 蔣總司令出兵討逆，由參贊戎機而統率勁旅，升任陸軍第四師副師長兼第十旅旅長。

民國廿年，因清剿江西共匪有功，升陸軍第二師中將師長。次年，調任八十九師師長。

八十九師新編未久，素質不齊，是一個戰鬥力與訓練都猶待加強的部隊。而湯恩伯接任師長後的任務，是由武漢開赴鄂東，担任清剿徐向前的匪軍。最初部隊開拔，每天祇行軍卅華里，尚有百分之十五的人落伍。但任務在身，又無較充裕時間，先行整訓，再行作戰，必需一面訓練一面作戰。也就是從戰鬥中完成訓練，從訓練中遂行作戰，因此，他創新一種特別的方法。

首先，他收拾起師長的官儀身段，而和士兵生活在一起，不但甘苦與共，而且親近如家人。由於他穿的衣服，和伙伕頗相同，他是一師之長，所以士兵們很親切的叫他「伙伕頭」，對他既尊敬又愛戴。他下的命令，不論有任何困難危險，全師官兵，都能貫徹奉行，而無怨尤陰違之事。

豫南、鄂東一帶，地形複雜，久經匪禍，滿目瘡痍。而匪軍機動剽悍，出沒無常，剿匪戰事，進行異常艱苦。他以身作則，激勵部屬，先從行軍方面，多加磨鍊，未入匪區以前，即不走大道，專走山路，越山頭，加強沿途搜索。宿營時，先就山嶺的稜線構築工事，再在陣地後方臨時搭架草棚，造飯宿營，絕不住民房。並且注意警戒。他還經常在山上用號音，調集部隊長到山頂去，聽他指導。久而久之，大家養成

習慣，不但不以為苦，而且由此演練成「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等到進入匪區以後，就以此成爲剋制匪軍的主要因素了。

譬如郭家河之役，徐匪向前以兩個師的兵力，圍攻八十九師一個團，企圖用「以大吃小」的戰法，一舉成功。但因爲八十九師準備有素，已佔地利，所以戰況膠着，未能迅即以多取勝。時間一拖長，反而遭受八十九師另一個團自鄰近山頭趕來夾擊，落得個慘敗潰逃。

再一次，八十九師行軍到瓦碎寨仰天窩山地，徐匪又發揮其打埋伏的特長，四邊來襲。可是，由於八十九師佔山嶺的習慣，迅即取得居高臨下以逸待勞的優勢，匪軍被迫仰攻，又受到很大的損失，無功而退。

八十九師在鄂東，經過一年清剿，成爲戰鬥力極堅強的勁旅，每日行軍增加到一百廿華里，尙無一人落伍。在湯恩伯的指揮下，轉戰各地，攻克守固，爲最有名的常勝軍之一。

事在人爲，湯恩伯於此，可謂牛刀小試，好的開始。

南北剿匪馳援綏東

民國廿三年，他參加江西剿匪戰役，晉任贛粵閩湘鄂剿匪軍第十縱隊指揮官，兼陸軍第四師師長，統轄第四、第十、八十八、八十九師，初隸東路，由閩西進，一路出奇制勝，連克將樂、泰寧、建寧等縣，

進入江西，與北路軍會師，再改隸北路，繼續南進。

當時，共匪主力蟻集贛南，以瑞金爲巢穴。而廣昌、石城、寧都一帶，山地連綿，匪軍深溝高壘，寸土必爭。湯恩伯自告奮勇，擔任主攻，連克白水、貫橋、驛前等地，殲匪極衆。

共匪爲保衛瑞金，再在桂鳳台一帶險地，設五道堅強防線，負固死守。兵力三倍於我軍。十一月，湯率部猛攻，酣戰數日，雙方死傷頗重，而敵陣不下。他以爲攻堅徒增傷亡，乃改用智取，對匪進行心理戰。遂親率軍樂隊到第一線，大奏勝利樂曲，我官兵伴樂而歌，士氣益壯。匪軍本已死傷慘重，但不知我軍虛實，遽聞我雄壯軍樂，情緒突變，軍心既變，射擊失準。他捕捉戰機，立即下令衝鋒。匪軍喪胆，蜂湧潰逃，我軍奮勇追逐，連破匪軍五道防線，光復瑞金。掃穴犁庭，卒收五次圍剿全功。

贛亂雖平，湘鄂贛邊區匪患仍熾，牽制我大軍七八個師，不能抽調來追擊由江西西竄的殘匪。民國廿四年，他奉命率部進剿，不一月，即聚殲匪軍於鄂西湖沼地區，斬匪首徐彥剛於大冶江畔。乃於崇陽軍次，就任陸軍第十三軍軍長。再於是年冬，率第四、八十九兩師，馳往湘西，在武崗、洪江一帶，擊潰賀龍匪部的竄擾。

朱毛匪軍竄抵陝北後，與徐海東、劉子丹合流，裹脅鄉愚，宣傳赤化，至民國廿五年初，已擴展至五萬人。惟地瘠民貧，糧食恐慌，乃思轉向較富裕的空間發展，於是年二月廿日分兩路渡黃河進犯山西，狼奔豕突，晉省四十八縣，均受侵擾，勢頗猖獗。閻錫山將晉軍編爲四個縱隊，分頭堵截，一面向中央請援。

。蔣委員長惟恐匪軍擴張，竄擾河南、河北，糜爛地方，甚至予日軍「防共」的口實，另生枝節，乃急調關麟徵的廿五師、呂濟的卅二軍，和湯恩伯的十三軍馳赴晉南協剿。閻錫山乃以軍委會副委員長的身份，將該三起部隊編爲第五、六、七縱隊。

三月廿一日，我軍七個縱隊，依外線作戰方式，向犯匪作向心圍攻，激戰至四月卅日，終將匪軍殲滅大半，殘匪渡河回竄陝北，山西肅清。湯也率部渡河窮追，復在瓦窰堡，痛剿殘匪獲勝，遂兼任陝北剿匪善後辦事處主任，準備再接再厲，克收徹底蕩平之功。

可是，內蒙古方面，情勢非常嚴重，五月二日，一個在日軍卵翼下的偽政權——內蒙軍政府，在距張北二百里的化德縣成立了，並且組織軍隊，又有「興亞聯合軍團」、「邊防自治軍」、「西北防共軍」等名目，準備進犯綏東。

五月廿六日，政府發表陳誠爲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担負清剿匪軍和籌劃西北國防的責任。六月，湯恩伯也奉命率部，在最機密的行動中，換用晉綏軍番號，避開日軍耳目，由陝北榆林開出雁門關，防守平綏鐵路的重要地集寧。

十一月初，僞蒙軍大舉自商都向西面的寶昌和張北移動；十五日，在飛機掩護下，企圖攻取興和、陶林，再奪綏垣、集寧，截斷平綏鐵路。

十一月十六日，綏省主席傅作義趕到集寧指揮我軍迎戰，湯部配合行動，終於擊退來犯僞軍，於廿四

日克復百靈廟。十二月十日，再克大廟。正準備進一步克復商都，乃因西安事變而終止。當時，傅作義名聞全國，湯恩伯和他的十三軍，却以無名英雄成爲安定綏東的一大力量。

南口奮戰漳河阻敵

民國廿六年七月七日，盧溝變作，十日，蔣委員長卽電湯：「迅速準備待命，並對冀察妥爲聯絡，務期中央與地方融爲一氣」。他奉令後，與宋哲元聯繫，願爲後盾。可是，當時北平、天津空氣沉悶，宋仍然主張妥協，尙無堅決抵抗的積極準備。他觀察日軍來意不善，恐怕再猶豫下去，必將陷於被動，乃於十六日電請 蔣委員長速頒動員令。

七月廿九日北平失守，八月一日，中央令派傅作義、劉汝明爲第七集團軍正副總司令，湯恩伯爲前敵總指揮，統率第四、八十九、廿一、八十四、九十四等師，進戍南口一帶，付予屏障察綏，牽制津浦、平漢二線日軍，掩護國軍在主戰場爭取餘裕時間的任務。

二日，他卽趕往郭磊莊與劉汝明協商，湯部以十三軍及高桂滋的十七軍爲主力，防守南口、赤城、獨石口，對東南構成防線；劉部廿九軍一部，以張家口、宣化爲根據，對北構成防線。

八月八日，湯部尙未完全集中，敵軍已自北平進攻南口，八十九師首當其衝，敵軍陸空砲火猛烈，且有戰車助戰，湯軍在祇有兩門戰防砲的劣勢裝備下，奮勇力戰。激戰十二日，敵軍死傷萬人，仍然無法從

南口正面突破湯軍防線。

馮玉祥曾在他所著的「抗日的模範軍人」一書中（民國廿七年九月出版）描述當時我軍作戰的英勇和湯恩伯的卓越指揮說：

「……敵人天天用飛機投彈和坦克車打衝鋒，重砲一分鐘也不停的打，弟兄們彼此說話都聽不清楚。但是弟兄們英勇得很，他們跑到敵人坦克車面前，從窗口槍口往裏面投手榴彈。敵人簡直不敢和我們打交手仗。就靠這種勇敢，守住了南口。」

湯將軍和弟兄們在一起，鼓勵他們，危急的時候，把勤務兵也派到火線上去；他穿着短衣短褲，到處指揮。

打到八月十八日，日本鬼實在沒有從正面再攻的勇氣了。我們雖然傷亡了一萬多人，可是敵人也死傷了一萬人……」。

由此可見南口之戰的慘烈雄壯，是敵軍侵華以來第一次所遭受的堅強抗拒和慘重打擊；同時，也表現了中華民族不可輕侮的正義力量。

在南口遭受敵軍猛攻之時，北方的劉汝明部曾經由張家口向張北發動攻勢，牽制敵軍。中央也下令河北的十四集團軍衛立煌部，由平漢路北進，經北平西部山地向南口迂迴，夾擊敵軍。傅作義也率一師又三旅，自山西大同來援。湯本擬乘援軍大集，反守為攻，但敵軍也已增加援軍，搶先再興攻勢。

在北方，敵軍由張北反攻，攻陷外長城的神威台和漢諾壩，使張家口危在旦夕，傅作義於廿日率重兵回援張家口。在南方，衛立煌的援軍雖說進展神速，但被永定河所阻隔，倉卒間無法籌集渡河船隻，以致未能產生適切的夾擊作用。敵軍乘此空隙，一面佯攻南口，拘束湯部主力；一面以生力軍迂迴南口右側的橫嶺和鎮邊城，猛施攻擊。我軍因兵力分散，裝備不足，被其突破，廿四日鎮邊失守，南口的後方懷來頓受威脅。

廿六日，湯部奉命向桑乾河右岸轉進，劉汝明部向洋河右岸轉進，傅作義反攻張家口失利，退守柴溝堡。察綏、南口之戰結束。

九月二日，湯再奉令率所部往順德、彰德一帶整補，並擴編爲廿軍團，轄三個軍（湯自兼十三軍，王仲廉長八十五軍，另關麟徵的五十二軍）。

十月中，敵軍沿平漢鐵路南下，進展神速，我軍兵力單薄，平原無險可守，戰局極爲不利。湯再奉令沿漳河之線佈防。他爲遏制敵軍狂進銳氣，特採攻勢防衛戰法，主動向進攻中的敵軍反擊。廿一日，他指揮五十二軍關麟徵的勁旅，向已渡過漳河的敵軍猛攻，激戰一晝夜，將敵軍擊退，攔截成功。敵軍意外受到阻礙，頗有傷亡，同時正以全力向山西省用兵，因此也就停留下來，未再南下，而與湯部隔河相持。

台兒莊施用運動戰

民國廿七年三月起，戰事中心在魯南，而以徐州的攻防爲主要目標。

二月上旬起，中央爲了加強魯南右翼防禦，防阻敵軍南下，切斷隴海路，由東向西包抄徐州，特先後抽調龐炳勳和張自忠部增援臨沂，曾與強敵板垣師團，發生多次激戰，殲敵五千餘人。三月廿日，敵軍向沂河東岸潰退，我軍固守臨沂，克復蒙陰莒縣，與正面的台兒莊，相爲犄角。

正面，敵軍自三月十七日攻陷滕縣（我守城的二一二師師長王銘章壯烈成仁）後，卽南向臨城。由於韓莊南阻運河，西鄰微山湖，運河以南，山陵連綿，不利機械部隊運動，所以敵軍企圖沿東臨台支線向東南迂迴攻佔台兒莊，再右迴旋進攻徐州。

台兒莊在運河北岸，又是台濰公路臨台支線的終點，形勢很重要，有居民三千四百餘戶，築石爲土城，有碉樓多座，南北相距一公里，東西相距二公里，爲運河一大要站，滿清漕運盛時，每年經此北運糧米四百萬担。隸屬嶧縣，西北相距三十四公里。

我軍迎戰戰略，是以孫連仲的池峯城師固守台兒莊陣地，誓死不退，吸誘敵軍主力；以湯恩伯軍團爲包圍之師，從敵側後進行右翼大迂迴，夾擊敵軍。另以孫震軍固守河防，扼守利國驛，鞏固徐州北方；孫桐萱、曹福林軍活動津浦線，破壞敵後方交通運輸，阻撓敵軍增援。

敵軍以頑強的勁旅磯谷師團爲主力，自三月廿四日起，卽開始台兒莊的爭奪戰，敵軍砲火猛烈，且有戰車助戰。我軍也運到新式重砲與平射砲，竭力抵抗，敵軍死傷甚衆，無法突破。

廿五日，右翼之敵板垣師團，爲響應台兒莊的正面進攻，也向我龐軍發動攻擊，臨沂危急。我張自忠部迅速馳援，才轉危爲安，擊退敵軍；進而前進沂水西岸，立定陣腳。

廿七日，我湯恩伯軍，由蘭陵洪山向西進攻臨台支線，直入北洛、南洛，襲擊礮谷師團的後路，礮谷前後受敵。於是，板垣乃在臨沂戰況不利的態勢下，抽調坂本旅團三千餘人，和騎兵數縱隊，於四月一日沿公路襲攻蘭陵洪山，抄湯軍的後路。敵軍行動迅速，且有機械化部隊協同壓迫，一時我軍頗覺情勢危急。湯恩伯當機立斷，除下令斷後部隊竭力撐拒，爭取時間，一面放棄已攻佔的南洛北洛，立即回師，以全力猛攻來襲的板垣師團部隊，爭回主動。在關麟徵的五十二軍和王仲廉的八十五軍的密切協同下，經過兩天的激戰，到三日正午，已將敵軍大部消滅。

正當湯軍在外線大勝時，台兒莊的戰事已到了最危急的關頭，敵軍不但已攻佔全莊的三分之二，而且有一部已衝到台兒莊南門，我軍十死七八，被迫渡過運河，僅保留西關的一部份。

湯恩伯把握戰機，迅即以得勝之師，再度南下進襲敵軍之後形成包圍。五日，與敵軍在底閣楊樓大戰，我台兒莊正面的孫連仲集團軍乘勢反攻，六日晚，敵軍突圍潰逃，退保嶧縣、棗莊，死傷達萬人以上。同時，死於台兒莊內爭碉堡巷戰的，也將近萬人。

本戰役，我軍無論是防守、應援、游擊，各方面都有極優異的表現。而湯恩伯的機變胆勇，却有過人之處，蔣委員長對於他的適時反擊，寄望很高，曾於戰況最激烈的四月二日，致電勉他：

「臨嶧台韓間之敵，經我軍連續進攻，殲滅過半，其退路斷，增援無望，尙作最後之掙扎。臨沂方面之敵，苦戰之餘，放棄戰場，竟分兵向台兒莊轉進；淮南之敵，不顧側背危險，向蚌埠集結；晉南豫北之敵，不惜放棄既得地區，抽出兵力，以圖策應；均足證明敵人對於魯南會戰之重視及其危殆之程度。仰我英勇將士，其應認清本會戰之重要性，並我軍得獲全勝之現狀，嚴令所屬，作最大之努力，爲戰略上適切之協同，促成絕對之勝利，以利全局」。

台兒莊大戰全勝，湯恩伯獲頒授青天白日勳章；而其擅長運動戰的威名，傳遍中外；同時，也更加重了他此後在抗戰中的責任。

氣魄勝人真誠動人

徐州棄守，湯部突圍成功，奉調往南陽一帶整補，中央調任湯恩伯爲第卅一集團軍總司令，指定指揮所屬爲中原機動兵團，隨時策應第一、第五兩戰區。

武漢外圍會戰時，再奉命前驅，指揮第廿、卅兩個軍團，及十八、五十四兩軍，轉戰於湘鄂贛邊區。民國廿七年冬，中央以抗日軍事，已進入長期階段，決定加強在敵後展開全面性的游擊戰。湯恩伯奉派主持南岳游擊班的訓練（仍兼卅一集團軍總司令），他任教育長，中共的葉劍英任副教育長，並且有共幹李濤、邊章五、薛子正等參加。調訓的是當時全國各戰區正規和游擊部隊連長以上旅長以下的長級中堅

幹部，以及少校以上的政工人員。

這是個不易應付的教育場面。一方面調集的英雄幹部，來自各方，素質背景不太單純；一方面是與曾經對壘多年的敵人中共合作服務，無形中存在一種極微妙的情勢，何況，中共一向是搞分化、搞鬥爭出了名的，如何確實辦好此一訓練班，不出問題不變質，是一種大學問、大能耐。

湯恩伯在此方面，却發揮了他統御的天才，而以「氣魄勝人」、「真誠動人」、「認真實幹感人」。首先提出：「對人誠懇，對事認真」的口號；並且強調：「對事不對人，爭事不爭利」。以樸實進步的革命作風，常能把握教育重點，吸引學員思想目標，環繞在效忠黨國，服從領袖之間。他善於揣摩羣衆心理的要求，當機立斷的解決許多難題而恰到好處。永遠表現他的無窮活力和真實感情，給大家無限的鼓勵和堅定的信心，進而帶回各個戰場，匯成一種巨大的長期作戰力量的洪流。

他對同來的高級共幹，有一種特別風度：在形式上待以學者名流的禮貌，實際上以與部屬相等的待遇，一視同仁，對葉劍英，尤處處表示推誠持重的態度。集會時，總是拉葉站在一起，進出時必並肩而行，每次講演後，更是照例請葉繼續講演。真誠處渾然了無痕迹；感人處，却又能使彼等尊敬他爲極信服的首長官。尤以葉劍英表現最爲顯著，葉在班中，平素以爲自己身份不同，常常於有意無意之間，流露自命不凡的辭色，惟獨對於湯教育長，則表示絲毫不苟的非常尊敬。可是，辦教育好像建造房屋，必需眞材實料；何況兩黨人物聚集一堂，更何況葉劍英一向以尖酸刻薄著名！所以，除了待之以真誠外，還要在游擊戰本

身，有一套充實的學養和精闢的理論，才能使其衷心悅服。

湯恩伯曾經利用演講的機會，發表他對游擊戰的宏論，他以為游擊戰有三個原則：①牽制優勢之敵。

②打擊同等力量之敵。③殲滅劣勢之敵。

八個要訣：①計劃要綿密。②準備要週到。③戰意要堅決。④戰機要看準。⑤掌握要確實。⑥企圖要祕密。⑦行動要敏捷。⑧戰鬥要果決。

根據這些原則和要訣，參照他自己練兵的心得，他特地編成五句口號，要大家熟記，切實運用：①看得準（明瞭情況，看準機會）②藏得穩（祕密企圖及行動）③抓得緊（確實掌握部隊）④來得快（行動飄忽，動作迅速）⑤打得猛（手段凶狠，盡力猛打）。

對於游擊戰的實際動作，當時（民國廿八年）他就提到：「敵進我退，敵退我追，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圍我散，敵散我聚」等戰法了。

最後，他總結游擊戰「重智取不重力奪，集小勝為大勝，無一定模式，必須隨機應變，必須與正規戰配合」。

由於湯恩伯至性至情的作風和真知實學的修養，使葉劍英等共幹深深敬服，不但沒有從事分化鬥爭等活動，反而實際合作的想辦好此一訓練。甚至當湯再度奉令赴前線督師抗敵，不得不離班之時，葉劍英在歡送場合居然激動得流出一眶熱淚，說出由衷感佩的話頭。

四省邊區固若金湯

民國廿八年五月，敵軍爲鞏固武漢防衛，消滅我野戰軍，特調集五個師團，騎兵一個旅團，戰車一個聯隊，分從荊鍾、襄花兩路向我進犯；我襄陽與棗陽的交通，被其截斷。湯軍（十三、八十五軍）位於桐柏山、鹿頭鎮一帶，與右翼友軍失去聯繫。敵軍長驅直入，陷唐河，向右迴旋，企圖包圍湯軍於戰場，一舉消滅。當時情勢危急，幸而湯恩伯由南岳趕到前線，從容佈署，以一部佯攻當面之敵，而集結主力於桐柏、唐河之間，猛衝突圍，轉進至泌陽地區後，突然轉方向，以奇襲方式，猛攻唐河敵軍。敵軍出乎意料，損失過鉅，被迫回竄。我各路大軍，乘勢協同反守爲攻，分頭追擊，遂得恢復原態勢，獲致隨棗會戰的勝利。

當時，電信一度中斷，蔣委員長深以湯的安全爲慮；及至捷報馳傳，大爲快慰，曾親電慰勉，關懷逾恒。

民國廿九年宜棗會戰，卅年豫南會議，湯再先後指揮第十三、八十五、廿九、第二、七十五、九十二等各軍，轉戰於鄂北、豫南，機動制敵。尤以湖陽鎮一役，幾使敵卅四師團的篠野重夫部隊嘗到片甲不回的慘敗苦果。

民國卅年，中共藉抗日戰爭兼併壯大，背叛中央的陰謀日益顯露，行動也日益激烈。魯、蘇、豫、皖

四省邊區，爲其出沒發展之地，加以敵軍窺伺，情勢相當危殆。於是，中央設置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發表湯恩伯爲總司令兼邊區黨政分會主任委員，旋再兼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授予整飭四省邊區、抗敵防匪的艱鉅重任。

湯就任伊始，正共軍陳毅部屢次在平漢路以東襲擊我騎兵第二軍之時。他乃抽調第廿九軍馳援，並且親赴皖北督剿，防廣兵單，苦撐良久，始克擊退犯匪，安定地方。嗣將逐次轉來轄區聽其指揮的部隊，力加整頓，先後編組爲第十五、十九、廿八等三個集團軍（分由何柱國、陳大慶、李仙洲任總指揮），加上原來的卅一集團軍（王仲廉任總指揮），共廿五個師又三個旅。

爲了發揮邊區的總體戰力，除了完成各種黨政措施以外，還特別本着便民的立場，爲地方解決實際問題，如普遍的修築交通公路，修築河南花園口到淮河數百里的堤防，建立戰時中學及邊區政治學院，收容中學學生三萬餘人、大專學生數千人，訓練由敵人勢力之下逃出來的朝鮮青年數百人以及誤入歧途的知識青年數千人。再如肅清政治貪污，解決惡霸豪劣，甚至下令全軍每月節食三日，結餘數百萬斤食糧，救濟旱災蝗災；都是膾炙人口的創舉。

自此，四省邊區固若金湯，共軍斂跡，敵軍也不敢輕舉妄動。湯恩伯一身繫中原之安危，戍地千里，統兵數十萬，東可支援蘇、魯，西可策應鄂、豫，負荷之鉅，處境之艱，未嘗不勞心焦思，戒慎恐懼。但也不免遭受敵軍和共軍之忌。

敵軍忌他，怕他隨時發動機動性攻擊；同時不消滅他不能進擾中原，打通平漢路。共軍忌他，不排除他，無法得志中原，向國民黨反攻。敵軍等待機會和他打硬仗，共軍則暗中搞陰謀破壞，破壞他的聲譽和軍民的信任，甚至輸送情報給敵軍，加重敵軍對他的壓力，想藉敵軍之手，來達到消滅湯的力量，好讓他們達到乘虛在中原發展的目的。於是，他成爲敵軍和共黨交相攻擊的目標。

中原會戰敗而不餒

民國卅二年，敵軍在海上的優勢逐漸消失，對漫長的南洋海上交通，發生恐慌，同時自美軍在華增強空中活動後，敵軍在長江的補給線也頗受威脅，於是有一「打通大陸路線」的構想，計議自次年春開始進攻，佔領並確保平漢路南段，及湘桂、粵漢鐵路的重要區域，覆滅我空軍基地，扼殺我空軍活動，以維持其在大陸上的南北交通運輸的暢通無阻，並產生取代海洋聯繫南洋的作用。

敵軍用以進攻平漢南路的主力，爲來自河北及豫東一帶的十二軍，共三個步兵師團、一個戰車師團、四個獨立旅團、一個騎兵旅團（約十四萬八千人，其中部份機動部隊，係自東北抽調的生力軍），和來自武漢的第十一軍部份策應部隊。

湯恩伯爲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對此緊張局勢，曾建議於麥熟及黃河春汛正盛時，襲攻開封、新鄉、中牟，先發制人。但因南邊武漢地區敵軍亦有蠢動跡象，所以此計議未及實施；而牽就情況，分兵部署於

平漢沿線要地，敵軍發動攻勢之先，湯適奉召在渝，預定赴印參觀中美訓練，中途聞警返防。而敵已於民國卅三年四月十七日，自黃河鐵橋及中牟方面發動強大攻勢。

當時，我軍分散，變更部署勢不可能，湯乃下令各部就地嚴密防守，遲滯敵軍前進，再覓戰機，側擊破敵。無如敵自東北調來機械化部隊，進展神速，銳不可當，我軍限於裝備戰法，一時無克制之方，以致各軍之間的連絡，爲其衝突截斷，而有處處受敵之虞。湯恩伯自率第十三、八十五兩軍，利用開封一帶既設陣地，與敵軍激戰兼旬，將敵第一零一師團擊潰，乘勝追擊到密縣。可是，敵軍一面自山西再抽調生力軍會攻洛陽，一面自信陽北上，與自許昌南下之敵會師西平，打通平漢鐵路南段。戰局發展，已非他迂迴側擊所可挽回，乃奉命確保伏牛山區。於是，他下令各部分別轉進，重新部署。

本戰役，雖說是整個第一戰區的責任，而非湯恩伯個人所可左右；雖說湯軍主力，並未被敵軍捕捉，敵軍死傷人數却比湯軍爲多，根據日軍記錄，曾有如下的片斷記載：

「……雖以機動之裝甲第三師團及騎兵第四旅團，超越強攻至臨汝，終未能捕捉戰意頑強之湯兵團主力，而被向大營及長水鎮方向退去……」。

「……據報卅一集團軍各部，竟已在豫西逐次集結，整頓態勢……我軍之作戰目的，始終未能達成。」

然而，此一戰役，我軍失去鄭州、許昌、洛陽、西平各重要據點，被敵軍打通平漢鐵路線南段，不能

不算是一次重大的挫敗。尤其對湯恩伯而言，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打擊，問題比較複雜，並不限於戰術與戰鬥。

就軍事觀點說，在不利的情况下，能夠保持有生力量，待機反攻，是為上策。然而，河南人民數年來倚湯為長城，當時正當麥熟，很希望國軍能像防守台兒莊一樣的堅守要點，掩護他們安全收穫。由於此一願望未能達成，以致一般輿論，對湯不滿。加以中共黨徒，惡意破壞中傷，對湯過去有關發揮總體戰效能的種種措施，極盡歪曲污蔑的能事。甚至有人責備他不該做事太多。當時，誠有「謗滿天下」的況味。可是，他毫無怨尤，不加辯解，惟有深自惕勵，痛加檢討，以待來茲。

他曾於當年八月十三日，命令所屬開「中原大戰檢討會」，切實檢討本身缺失；一連三天他自己每天都有語重心長的講話。並且於八月廿日，再手諭所屬：

「……

同志們！我們聽夠了外面的批評和攻擊，也受夠譏笑和侮辱，誰說是人心澆薄，這都是我們自己造就的惡果！

軍人唯一的光榮，是戰鬥的勝利。今天我們失敗了，還有什麼話可說？不怕你以前件件都是真理，也不能不被否定了。

我們良心未死，熱血未乾，應該很坦白勇敢的承認自己的過錯，找出自己的缺點，痛下一番反省的工

夫，將來戰鬥的機會正多，我相信我們不致一敗再敗的。同志們，覺悟吧，努力吧！我目前對大家唯一的要求，是努力反省，改過自新，報仇雪恥。

誠意正心修身，是治國平天下的唯一素養和手段。我們此次的失敗，就是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的緣故；思想腐化、生活墮落的幹部，尚能治軍作戰嗎？實在痛心。今後如何正心誠意，如何修身，是我們必須每天再三反省的課題。

最後，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要求大家克己、自立、自強。」

全軍上下，受他的精誠感召，莫不發奮圖強，誓雪此恥。因此，經過短期整頓，復成勁旅，而為多難的國家，担負更重要的作戰任務，獲致輝煌戰果。

臨危受命反攻桂柳

敵軍打通大陸路線的戰役，至民國卅三年十一月，已由湖南沿粵漢路打到廣西，再沿黔桂鐵路線急進，十二月一日侵入黔省，繼續北竄，陷獨山，威脅貴陽。一時情勢緊張，重慶震動。中央除派何應欽將軍前往貴陽鎮定人心外，並即發表湯恩伯為黔桂湘邊區總司令，責成其剋日赴前線，肩負指揮作戰任務，嚴阻敵軍再次深入。湯臨危受命，先隻身赴調，並催促赴調在途的第十三、廿九、九、九十八等軍兼程前進（另中央並自滇緬戰場空運新六軍部份部隊回國）。

在貴陽，他遇到正在辦理緊急救濟難民的社會部長谷正綱，談起當時情勢。谷問他：

「在此危急局勢中，你將如何以現有的少數殘廢之師，和日軍作戰，以達成抗禦強敵屏障陪都的任務

？」

他堅決的回答：

「依我的看法，敵人不敢深入。如敵人再直趨貴陽，以今天我指揮的兵力和士氣來說，是有困難。但我必須竭盡可能，抱定破釜沉舟的決心，激勵同仇敵愾的士氣，與敵人拚鬥到底，以盡革命軍人的天職。

當時，谷相當欽佩他的忠義精神，即表示願與他共同努力奮鬥。

等到各地援軍大集，他即下令張雪中軍阻擊敵軍於都勻正面，孫元良軍迂迴敵後，一戰而阻敵攻勢。敵軍被迫放棄獨山，撤出黔境，一直退到桂西河池，才穩住陣腳。

先是，為改善我軍的裝備與補給，我國曾與美國協商美援及部隊整編問題；是年冬，獲致協議。我國乃於十二月廿五日成立陸軍總司令部於昆明，任何應欽將軍為總司令，下轄四個方面軍，接受美式武器裝備，加強後勤設施，士氣戰力均大為提高。湯恩伯受任第三方面軍司令官，統轄十四個新裝備的步兵師和若干砲兵部隊。

民國卅四年四月，敵軍作最後蠢動，攻擊我湘西芷江空軍基地，被我軍擊潰，我軍乘勢反攻桂柳，並

計劃進一步攻略廣州。當以湯恩伯的第三方面軍爲主力，一部沿桂穗公路，翻越越城嶺山脈攻桂林，另一部沿湘桂路直取柳州；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則以一部兵力出都陽山脈攻南寧。

南邊一路，於五月廿六日攻克南寧，將敵軍驅出龍州國境之外；一面收復桂平、武宣，肅清兩江敵軍，進迫柳州。

中間一路爲主攻，於五月廿日克河池，但於六月初進展到宜山時，遭遇敵軍極頑強的抵抗，形成激烈的拉鋸戰。湯恩伯親臨前線指揮，鼓作士氣，美我空軍也飛臨助戰，戴笠所兼領的軍委會別動軍第七、第十兩縱隊，甫接受美式訓練裝備完成，也馳往戰場，側擊敵後，破壞交通。敵軍不支，於十四日潰退柳州。湯軍揮師續進，於廿九日再克柳州。

湯恩伯爲了不讓敵軍有喘息整備的時機，當決定迅卽由柳州沿桂柳公路和鐵道，分路進攻桂林，並下令原由北邊翻越越城嶺的一路，繼續加強攻勢。

各路大軍，自七月初分道併進，北路之師越過越城嶺後，分兵攻擊金州、新安、義寧，於廿六日克義寧。正面沿鐵路進攻之師，於廿四日克永福，沿公路之師，也同日攻克陽朔。廿七日，各路大軍迫近桂林城郊，敵軍由金縣、新安一帶一再反攻，尙圖滅除側後威脅，死守桂林，但被我軍擊退。而別動軍第七縱隊也乘夜一度襲佔桂林與衡陽間的重要城市祁陽，使敵軍倉皇失措，不得不於廿八日放棄桂林，狼狽逃走。

何應欽總司令，已策訂反攻廣州計劃，湯軍仍爲進攻主力，正部署間，敵軍宣告無條件投降。

京滬受降以德報怨

敵軍投降，湯恩伯接受一項非常光榮的任務，主持京、滬地區的受降。當他於九月八日，自柳州乘機飛抵上海，坐敞篷汽車在市區作凱旋式的巡行時，誠爲他一生中最難得也最幸運的際遇。

蔣委員長對日軍投降官兵，採取以德報怨政策，寬大懷柔，用意深遠。但戰爭剛結束，日軍殘虐我軍同胞的血腥猶在，所以如何秉承此一偉大旨意，徹底奉行，避免國人比較激憤的干擾，是件難辦的事。

湯恩伯以最大的忠誠，執行此一政策，獲得上海市民的充分合作。當時，集中上海候補遣返日本的戰俘與僑民，超過八十五萬人。他下令設立一個「日僑管理處」，對上海日僑集中居住地區虹口秩序的維持，多所注意督率。在嚴寒侵襲下，照顧他們的衣食醫療，甚至關切到兒童教育問題。他曾再三的告誡主持遭俘的部屬說：

「無論日俘或日僑，都是戰爭中無辜的受害者。在國破家亡之餘，我們需早些送他們回去，開始重建工作，莫使流落異域。」

當日軍第十三軍高級將校廿餘人，由上海被遣送回日本時，他特別致詞送別，曾提起：

「中國與日本，隔海相望，互成犄角，人爲同種，文爲同文，合則共存，分必同亡。八年血戰，而今

兩敗俱傷，痛定思痛，我兄弟應抱頭痛哭。今日棄干戈而送君回去，他年當迎君懷玉帛以重來！」

語重心長，使許多日本軍官感動得痛哭流涕。

前日軍駐華總司令岡村寧次，曾於一九五一年在日本某一次歡迎湯恩伯的場合，發表當年湯對日俘種種寬大的祕密，茲節略如下：

「凡是敗北投降的軍隊，在解除武裝時，都應該將將校、士官、士兵，分別收容，受俘虜的處置，這是國際上的慣例。然而，當時在中國，却把我們當作徒手官兵處置，武器雖然繳出了，但仍保持着軍隊的形式，直到返國為止。同時又承認我的指揮權。爲便利我行使指揮權，更將通信機件、飛機、汽車、單車等交通器物，在某一時期，全部貸與。因此遣返工作，進行極爲迅速與順利。當時我國（日本）在國外軍民約五百萬，其中在中國者約二百萬。此二百萬軍民，不到一年，幾已全部返國。經過上海者約八十五萬，全都是湯恩伯將軍的幫忙。

「湯將軍曾下令說：『日本人所持有的國寶級的書畫、古董、刀劍等寶物，應行全部包紮，向本司令部提出。因在中國方面，比本人的地位更高的人甚多，此等寶物，殊爲麻煩，故準備將其集中一處，建一博物館將其陳列，一則以防散失，再則俟將來日本人歸來時，以便返還其本人』，是時即以西本願寺作爲陳列此類寶物的博物館；同時，又將安置了的遺骨，全部集中館內，加以嚴密的監視。

「當時日人所遭遇的難題，層出不窮，但湯將軍終於依照日本方面的希望予以解決；使在上海居住的

十五萬日人，至乘船返國之日爲止，均十分安全。

「在遣返開始時，關於攜帶行李的限制量，美國方面主張每人祇許攜帶十五公斤，中國方面則主張可攜帶五十公斤，最後折中爲卅公斤。就卅公斤來說，足以裝滿柳條包一個。當時又由直屬湯將軍的參謀林日落和龍佐良兩少將，直接向湯晉言，准予將鋪蓋捲和食糧另外攜帶，不在卅公斤之內；當獲湯將軍許可。單就廿四萬日僑所攜帶的被褥來說，在當時的日本，可算是幸事了。當時大家都說，由上海回國的日本人最幸福，其故不外乎此。

「湯將軍自始即主張：日本戰犯，只懲處代表的人物若干名，其他全部不應問其罪責；但後來爲了種種關係，達到一千餘名戰犯，此後他仍然不斷主張減免其刑。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又向蔣總統直陳，終於決定將全體戰犯釋放……後來中日和平條約成立，其中規定將日本戰犯全部釋放，其淵源實來自湯恩伯將軍的絕大同情」。

民國卅五年四月，遣返日俘告一段落，湯奉命出任京滬衛戍總司令兼第一綏靖區司令官，自上海移駐無錫，七月，升任陸軍副總司令兼首都衛戍司令官。

堅持忠節保衛淞滬

民國卅六年春，奉命指揮魯南軍事，不一月，連克費縣、蒙陰，俘匪逾萬，斬獲尤多。正準備乘勝向

莒縣、沂水挺進，却逢陳毅匪部圍攻我整七十四師張靈甫部於孟良崗，湯揮軍從外線迂迴急救不及，張軍全部犧牲。他遂毅然引咎辭職，不稍辯解。惟基於經驗教訓，主張此後戡亂軍事，應分層負責；尤須集結主力，以遂求殲滅匪軍的野戰軍的主要目標，而不必過份重視一城一池的得失。七月，代理陸軍總司令，編練第二線兵團。次年，調任衢州綏靖主任，屏障閩浙。

民國卅七年冬，戡亂戰事逆轉，匪軍威脅長江，他再次臨危受命，就任京滬杭警備總司令，兼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鎮攝東南，負責保衛江南精華之地。

民國卅八年一月，蔣總統引退，李宗仁代理總統，政府頓失重心。和談之說，甚囂塵上，甚至有人主張在上海和談；民心士氣，相當消沉，但湯恩伯對是非順逆，看得非常清楚，表現得也最堅決。曾經直接間接的公開宣稱：

「如果李宗仁代總統要舉行所謂和平會議，請到北平、天津去，不要到南京、上海來開會。」

「李代總統如要向共黨投降，我們不能負他的安全責任。」

南京撤守之前，在一次重要會議中，辯論共匪所提和談條件，動搖份子還想討價還價；湯恩伯即席凜然表示：

「這根本不是什麼談和條件，而是一紙投降的通牒。如果你們要談的話……我走了。」

說完，掉頭不顧而去。由於他手握重兵，一再堅決反對和談，對李宗仁的亂命，不予理會，才無形中

影響了「和談」，使其成爲毫無結果的醜劇，而爲黨國撐持一分「時窮節見」的氣節。

共匪深知湯恩伯的將才，如欲以武力奪取江南，勢必付出極高的代價；於是想用利誘方式，作瓦解之計。先是，當湯恩伯早歲留學日本之時，苦於難籌學費，曾求助於從未相識的浙江第一師師長陳儀，陳儀慷慨允諾，此後一直保持聯繫，有「親如父子」的情誼。共匪利用此一關係，透過陳儀（浙江省政府主席）向湯提出優厚的「和平」條件，如湯接受，則可身爲紅朝新貴，匪軍可以兵不血刃底定江南。湯立即向在奉化的蔣總裁報告，並於二月廿一日將陳儀逮捕。以果敢的行動，顯見其「大義滅親」的凜然正氣。

湯恩伯深知共匪必將渡江南犯，搞「和談」詭計，是爲了拖延時間。所以他自始即從軍事上作固守江防的打算。

然而，江防千里，防廣兵單，可用的兵力，祇有正在整補的兩三個軍，和一些預期由東北、山東、淮河流域轉進歸來的部隊，無法處處設防，必需形成重點，並且要預作萬一江防不守的次一步行動計劃。所以他主張憑藉淞滬既設陣地打擊匪軍。爭取時間，轉運上海物資，充實台灣。但當時李代總統的軍事當局，却堅主以皖南爲重心，向富春江、仙霞嶺轉進，逐次阻擊南侵的匪軍。他以爲皖南交通不便，不利大軍行動，徐州轉進一蹶不振，前車可鑒，堅持不可；但未蒙採納。當部隊正在變更部署之時，匪軍乘隙於四月下旬由蕪湖以西渡江進犯，江陰也相繼不保，向皖南一帶集中的大軍受到巨大損失。他迅即統率下游江防部隊，依其預定計劃，轉進淞滬，作保衛上海的部署。

沉痛告別上海市民

在湯恩伯將軍指揮之下參加上海保衛戰的部隊爲第十二、廿二、卅七、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七十五、九十九、一二三、二〇四等軍和青年軍一個師，還有六個交通警察總隊（大都殘缺不全），約十五萬人。而陳毅進攻上海的匪軍，却有四十萬之衆。

上海社會複雜，奸人藏匿滋事，共匪更從中煽惑破壞；因此，國軍面臨的戰爭，不僅僅是一場衆寡懸殊的武力戰，而且也是一場艱鉅的總體戰。然而，湯恩伯却以無比的信心與勇氣，於旬日之內，重振士氣。谷正綱爲了堅決反共，辭去社會部長的要職，特地趕到上海，協助他主持政務；負責上海黨務的方治，也協助他積極發動民衆，贊助勞軍，穩定金融，安定地方，振奮人心。由於上下精誠團結，所以守滬國軍能以逆勢兵力，自五月十三日至廿四日，殲匪達十三萬人之多。

當時，戰況激烈，匪軍炮火兇猛，我軍司令部及方治等私人住宅，亦遭轟擊，陸上交通斷絕，機場也被侵奪。情況萬分惡劣之下，他曾對谷正綱和方治說：

「恩伯分屬軍人，守土有責，戰死沙場，以盡天職，實爲光榮。但兄等都是文人，且非地方官，共陷險地，至爲不安。」

五月廿五日，大軍奉命由海上撤退舟山及金廈外圍。他集合高級將領，傳達撤守命令時，熱淚盈眶，

一再表示：

「對不起 領袖，對不起民衆，對不起國家」。

而其告別上海市民的文告，尤爲沉痛，真可謂一字一淚，語重心長，可以想像他內心所感受的痛苦。可是，守滬之役，他確已盡了最大心力。當七萬以上大軍登輪撤退時，上海秩序仍然良好。匪軍炮火雖已集中射擊撤退船艦，但官兵魚貫登輪，依然井然有序。從此，可見到他治軍的優良和佈置的周密。

金門決勝鞏固台灣

淞滬撤守後，隨即建立舟山及金廈外圍陣線，是年秋，湯恩伯駐節廈門，蔣總裁擬發表由他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賦予指揮作戰與處理地方行政的全權。可是，李宗仁却公開聲明不予同意。李的意氣用事，不顧大局，使湯不勝憤慨，而且也進退失據。幸而蔣總裁對湯的處境，極爲同情，除特電慰勉外，並且親自廣州赴廈門，召集湯所部團長以上的將校，慰勉他們，繼續在湯恩伯指揮之下，抗匪報國。當晚乘船返台北，臨行與湯話別，多所鼓勵，希望他能在金廈擊退匪軍，爲公私爭氣。

湯受蔣總裁的感召，籌劃金廈防務，他認爲匪軍重視政治價值，先攻國際聞名的廈門商港的可能最大；我爲正當軍事價值，務需確保金門。乃釐定方針，力求於廈門正面消耗匪軍，而迅速以主力鞏固金門，殲滅來犯匪軍。

最初金門兵力，祇有一個特務團，於是他將李良榮兵團部和所統轄的一個整補軍，裝甲兵營移駐金門，又將新組成的第五軍（軍部及一個師）開往小金門。

十月十七日，匪陷廈門，積極準備渡海進攻金門。廿二日，蔣總裁急電湯：「金門不能再失，必需就地督師，負責盡職，不能請辭易將。」並即從台灣調第二〇一師赴金門，電令原擬他調的胡璉兵團，迅即改道赴金門增援。

湯以爲防衛金門的問題，是匪軍主力將在何處登陸。當就雙方軍隊位置、地形、風向，以及我海軍支援所受地形限制等因素加以分析比較，認爲匪軍主力登陸公算最大的地區，應在古寧頭附近的東方一帶海灘。於是，他立即指示將主方向金門西部集結。恰巧，胡璉兵團的主力，正陸續乘船抵達料羅灣。因爲卸載設備不足，一船人員輜重裝備，幾乎要費時六七個小時，才得登岸。他知道此事，立即下令所有大小船筏，一切運輸工具，均調往料羅，並且親往監督，不分晝夜，於廿三日全部卸載登陸完畢。隨即向金西完成配備。

廿四日，匪軍八個團二萬餘人，附砲五十餘門，以汽艇二百餘艘，分別在金門的壠口附近，以及林厝、古寧頭東北海岸強行登陸。我軍裝備充份，立予迎頭痛擊。我海、空軍也馳往助戰，力阻匪軍增援。血戰至廿七日，匪軍戰死三千餘，被擊沉溺斃於海上約萬餘人，被俘六千餘，全軍皆墨，裝備盡失；自受此創後，不敢再言渡海來犯。我軍久敗之餘，獲此全勝，關係此後的安定至大。

本戰役，當時接受湯恩伯指揮的部隊，多係臨時奉令隸屬的，並無淵源的主從關係。而自李宗仁公開聲明否認湯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以後，湯的指揮權責，也不夠明朗。但由於蔣總裁的親臨勗勉，和湯本人的威望和赤誠，居然人人効命。而他卜晝卜夜的工作，和不避艱難的英勇行爲，也都在在使部屬感動。所以才

能轉弱爲強，獲得以寡勝衆的戰果。

凱旋歸台，調任東南軍政副長官，再調總統府戰略顧問。金門防務，由胡璉負責。

中日合作卓見深遠

在台四年，他已退休，雖然多病，但對充實學問多求知識的興趣，却與時俱增。曾經和他的舊部多人，組織講習班，請了好多位教授，講授哲學、經學、歷史；他從不缺席。並且喜歡涉獵些文學與歷史的書籍，曾經對詩歌發生興趣。

他對日本，有深刻的認識。他以為日本民族是一個誠懇的民族，是一個敬事（認真）的民族。日本人學「漢學」，能夠體會到中國儒家思想的精髓，以之用於實際政治。根據歷史家論斷「明治維新」，其起因固然是受到西力東漸的衝激。但其原動力，却由於中國儒家思想的「王霸之辨」。所謂「尊君抑霸」、「大義名份」等等微言大義，促成了「大政奉還」、「王政變古」；才有「明治維新」的盛事。

他以為當時的中日兩國，都面臨共產極權集團的威脅，風雨同舟。彼此應該拿出本身具有的力量結成

一條強固的防線：第一步阻遏匪俄在東亞暴力的再擴張，鞏固兩國新生地位。第二步摧毀並鏟除大陸的共匪，奠定中日兩國建設基礎，走上富強康樂之路，達到共存共榮的永久目的。

可是，某些短視國家，仍隨時準備出賣中國，以綏靖匪俄；損人利己，圖苟安於一時。民主國家此一矛盾，衝激日本；加以匪俄對日本的和平攻勢和貿易誘惑，使日本陷於搖擺不定的狀態之中，這是非常危險的事。

他對於此一趨向當然關切，嘗分別在國內外各大報刊發表文章，正告日本朝野，毋墮匪俄奸計；並懇切呼籲：

「中日合作則兩利，乖離則兩敗俱傷，這是孫中山先生在數十年前就大聲疾呼過的，我們過去痛苦的經驗太多了，千萬不可再蹈覆轍，應該堅強地團結合作，共圖兩個兄弟之邦的百年大計。」

另外，他還在與日本友人通信中，再三就此問題殷殷致意，茲擇錄其一鱗半爪，具見其誠意與遠見：

「日本如不能迅速恢復國際地位，不能自主，則一切問題，均談不上，故我們目前唯一的工作中心，即如何使日本能早日恢復國際地位，成爲一個民主獨立自由的國家，來共同擔負反共抗蘇之時代使命。」

「我始終認爲中日兩國應該站在一起的，八年的戰爭，彼我都有了新的覺悟。不論那一方倒下來，均是中日雙方的損失。反共抗俄是目前中日兩國的時代中心任務。日本復興，與我們的復國；都要在反共抗俄的目標下團結起來。所以今後中日的關係，非特要合作，而且要團結，團結是比合作更進一層的。今後

反共的戰爭，可能是長期的，不止十年八年，反共的前途，是一件長期的苦鬥任務。」

「中國短期內絕不會產生第三勢力，有若干美國人希望中國出現第三種勢力；這是不了解中國現實環境與歷史環境的一種幻想，是不可能的。中國反共抗蘇的主流，依然是國民黨，領導中國反共抗蘇的，依然是蔣總統，絕不會有什麼第三種力量的產生。中國的人民，亦不許可第三種勢力的形成。因為歷史的教訓受夠了。產生一種新的形勢和力量，不知道要犧牲多少人民？經過了多少的磨折；現在中國的環境，再受不了大犧牲和大破壞；而且時間上也不許可。所以希望日本人能夠了解這一點，來幫助中國國民黨和蔣總統。」

湯恩伯已經從有形的武力戰場上退休了，但他於退閒之際，猶能進修不輟，時刻不忘國家；猶能在另一個無形的戰場裏，為國家竭盡他的智力，多所貢獻。其謀國之忠，任事之勇，誠非常人所能及。

鞠躬盡瘁名垂青史

湯恩伯和易近人，藹然長者；其不平凡處，正包含於平凡之中。他是一位實行家，一生以踐履篤實、率先躬行為信條。凡所要求於人者；必先反求諸己，自己先做。他富有高度的責任感，所欲責於人者；必先自責。特別是在作戰期間，當戰局緊要關頭，往往廢寢忘餐，不眠不休，日以繼夜，宵旰勤勞。凡戰線最危險的處所，也就是他所在的位置；他的確做到了：「向最危險的方向前進」的戰鬥信條，但也因此

體力預支過多，終致積勞成疾；又復力疾從公，疏於療養，遂致釀成絕症，奪其生命。

最早的病徵，發生自鄂東剿匪之時。那時他經常披星戴月，沐雨櫛風，非常辛苦；加以飲食粗劣，寒暑不調，因而患上嚴重的胃病，甚至不能乘馬。窮鄉僻壤醫藥兩缺。爲了軍情緊急，責任重大，常倚臥於担架之上，指揮部隊，激戰於崇山峻嶺之中。蔣委員長曾經一再面諭他應當請假稍事休養，而他則以剿匪軍事正在順利，未減頑匪，不肯先談休息。及至民國廿三年初收平閩變之役，仍與疾行軍，未稍逡巡。由是而積輕爲重。來台以後，深居三峽，自甘簡樸淡泊，常感不適。爲了節省醫藥費用，曾在三峽割盲腸。最後於民國四十三年春，胃、腹部疼痛難忍，經中心診所檢查爲胃潰瘍與十二指腸瘤，必須迅速割治，否則於八個月內將有性命之憂。於是有關方面和友人，都主張送往美國割治。但他怕赴美費用太多，自己既無積蓄，也不願多耗公帑，而日本友人較多，可以就近照應，節省費用，日本的慶應醫院也表示有治療把握，歡迎就醫。於是決定赴日割治。

他在日本慶應醫院，接受三次大手術。當第一次手術時，發現他除了腸胃外，肺、胆部也有嚴重的病狀。卅年的戎馬生涯，竟使他的身體，敗壞到百孔千瘡的地步；這是目前仍在享受自由生活的人們，應當對他表示深刻的同情和崇高敬意的。最後，終告不治，而於民國四十三年六月廿九日申刻去世，得年五十四歲。官陸軍上將。

綜觀他的一生，篤信主義，盡忠國家，臨難不苟，指揮若定，確已善盡革命軍人的天職。平居復雅重

文事，凡官士有一藝之長的，多予以推崇和獎掖，用收文事武備一爐而冶的功効。他本人好讀書，喜翰墨，所作函札文稿，大都楚楚可觀。而其雍容平易風度，也可顯見他有深厚的修養。

他雖久縮兵符，屢當方面，却從不假借權威，爲一人一家打算。他逝世以後，景況蕭條，幾致無以爲殮。而其部屬，也大都清苦。世俗每疑權勢可以致富，其實此說不足以方喻真正的革命軍人。請看他的生前身後，可以證明了。

談到他的治軍，五德兼備，古所難能。

他非常重視紀律，信賞必罰。令下，無不達成；每有戰績，不自居功；每獲奉獎勉，卽感激流涕，嘗謂：「每得一份獎勵，增一分內疚」，曾有人爲他代請晉級，他聞知婉轉辭謝：「余已受黨國厚恩，而未能一清海宇，內疚之心，無時或已；倘再晉級，將使余愧死」，所以他雖然幾任總司令職，而祇以上將銜終其身。其清介抱負，可稱光霽日月了。

他平素與士卒同甘苦，愛護官兵若子弟；然對於違犯法紀之徒，絕不稍事寬假。抗戰末期，人民生活已然異常困苦，而軍中尤甚。士兵的戰鬥意志雖然堅強，但因爲物質生活過於匱乏，多少影響到士氣，他日夜繁忙之餘，每抽暇與士兵共同飲食，作實地考察，所以能洞悉事情。當時軍中一般尙存積弊，或有中飽現象。他大聲疾呼：「一切爲士兵、一切爲前線、一切爲勝利」，號召各級官兵努力奉行，並且嚴令後勤機構，對軍品餉糈，確實補給，不得刁難遲滯，否則從嚴法辦，因此，全軍士氣大振，樂効生死。

他治軍公正嚴明，賞罰之間，兼顧情理；而教導多於責難，部下對之，莫不懷德畏威。他注重考核工作，經常獎勵部屬埋頭苦幹，實事求是；最討厭投機取巧，阿附諂媚之輩。是以全軍上下，都知道確守崗位，貫徹命令，達成任務，只要有工作實效，絕不會被埋沒。

論「將道」者，我國以「三達道五達德爲修養基礎」，西方則克勞塞維茨強調：「智情意的合一」。而湯恩伯的統御，已融合中西理論於一體。凡是曾和他共過患難的高級軍人，都感受到：在授受應對之間但覺其嚴厲處，是位威肅的長官，而其慈祥處，則是位愛拂的家長；其認真處是位嚴格的老師，其隨便處，則是位至好的朋友。他從不尙權術；而完全是發乎至誠的情，適於至正的理；是一種堂堂正正的統御大道，仰之彌高，而卽之在邇。人人懷德畏威的心理，完全是本乎天然，而無絲毫外在物慾存乎其間。這是他治軍爲將最成功之處。

他對人，特別具有一種光熱力和吸引力。任何人見到他，都能爲他的熱忱所吸引，特別是有才幹的人，不必透過別人介紹吹噓，也不必當面恭維歌頌；縱然有時意見不合，形成爭執，或竟當面頂撞；他能忍常人所不能忍，接納別人正當的見解，絕不固步自封，死要面子，而且事後對其人其事，毫不存任何芥蒂，而使人如沐春風。他事親至孝，當抗戰進入最緊張階段，他的父親佐卿公在浙江原籍病逝，他墨經從戎，無法分身歸里治喪；心念太夫人晚景淒涼不已，就任魯、豫、鄂、皖四省邊區總司令後，駐節淮上，距浙較近，乃派人返里迎親到任侍養，幾經周折，始由安徽蚌埠安全轉入我方境界，由水路乘小輪北上。他

聞此佳音，特由駐地棄縣，趕往界首迎候。預計小輪下午六時可到，但候至八時，仍無消息，他叫大家先吃晚飯，大家勸他也先吃再等，他却表示：「此飯原定與家母同吃，再遲，也得等。」一直等到晚上十時，小輪才到，他手挽母親步行，一路流着眼淚。抵達招待所後，才陪侍母親吃飯，閒話家常，對老人家表示：「這真是七七事變以來第一頓最可口的晚餐」。一種自然流露的純孝之情，令其左右人員，感動不已。他去世，太夫人仍健在，倚閭盼望，情何以堪。陳誠副總統曾有輓他的對聯云：「環甲冑以衛邦家，戰壘勛高，出塞早傳三箭定；聞鼓鑿而思將帥，慈闈親在，倚閭不見一帆歸。」最能道出他「白髮先送黑髮行」的沉痛不足之情。

湯恩伯爲當代名將，僅得中壽，而今後伐罪救民，猶待大張正義之師，鑿鼓思良將。有心人悼惜他盛年早逝，而有「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的感傷。而歲月如流，何日才能光復錦繡河山，也因之不勝警惕慷慨之情。當湯將軍逝世十週年祭時，黃杰曾有輓詩一首，最爲痛切，特抄錄如左，並用以結束本文，詩云：

「鼓角當初絕戟門，戈回落日夢難溫；最憐墓草青還後，風雨年年愴客魂！」